

邵

邵燕祥之卷

第一辑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一辑

邵燕祥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一辑)

邵燕祥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9,000 印张：4.375 印数：1—10,300

书号：10456·168 定价：0.82元

湘艺：86——11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为官容易读书难”	3
有甚于画眉者	5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8
也是“可怕的现象”	11
说自杀	14
人是有尾巴的吗?	18
从两句唐诗说起	21
议论安娜好	23
爆竹声中.....	26
读史一得.....	29
公文选读.....	31
美与丑	35
“专案遗风”考	37
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	39
迪斯科诗话	43
打倒与骂倒	50
批判“大批判”	53
“娘打儿子”论	55
肖与不肖	59

别字别解	62
海阔天高说“文网”	64
读马列书，所学何事？	67
想起了“文字论战的规则”	71
鞭·马·人	74
夜读书录	77
“对号入座”好	92
夜读偶忆	95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98
凉咖啡与温酒	101
山水也分名次吗？	104
封建的魔力	107
“弄斧班门”	110
避暑山庄偶感	113
两个孟姜女	116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119
好事怎样变成坏事	122
建立“‘文革’学”刍议	125
世无完人论	128
未能免俗	132
编者后记	135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

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为官容易读书难”

报载，有这样一位科长，对他属下讨论“八大”文件的同志训话，要大家学好上级布置的“八个大文件”云云。

哑然失笑之余，我想起小时候朝夕相对的一幅中堂，上面有句说，“为官容易读书难”。这出自一个官僚的手笔，感谢他无意间说出了老实话。在他，“为官就是为官”，骑在人民头上，信手搜刮，可使“天高三尺”，倘有靠山可凭，大权在握，本不是什么难事。

单口相声《连升三级》不是也讲到这么一个角色么？目不识丁，不学无术的张好古，居然在翰林院里混了三年，全仗着一句“好的好的”，应付了许多差使。这虽然是艺人的讽谕，其实在那卖官鬻爵的社会，确是不乏其人。

今天可不不然了，不管在什么职位，都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容易，得有真才实学，要服务得好，得读书——广义地说，就是学习。例如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八大”文件，以及党和国家

的许多政策；还要学习专业知识，比方从事戏曲工作吧，就该知道《乱世鸳鸯》和《拜月记》是一出戏，不把前者当作黄色戏曲禁演等等。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勤务员，本来无所谓官，不过在这当中，为人民服务得不好的官僚主义者是有的。官僚主义事出有因，而且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身居领导职位而不学习，不读书，思想僵化，精神空虚，结果不是“为官容易”，倒是“容易为官”——很自然地成为官僚主义者。但是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这就使官僚主义者处境很不“容易”，“上压下挤”，十分难堪。

无如并不是每一个“此中人”全都意识到这一点。某科长仅仅只是在督促别人学习“八个大文件”，放眼看来，又何独某科长为然，所以非敲起警钟不可。

“为官容易”与否，姑且不去管它；“读书难”这是事实。若不想浅学辄止，或仅仅背诵教条，那么每一课都要付出老老实实的劳动。若不想成为“只做官，不做事，”终于被人民屏弃的人，而想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就不能吝惜这份劳动。

让我们记住“八个大文件”这个新典故，经常引以为戒吧。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有甚于画眉者

近来，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颇引起一些有关道德的议论，因为作品涉及了爱情和婚姻分离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我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我并不提倡现在没有爱情的夫妇都去离婚（倒是要劝这样的夫妇学习喜旺、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建立团结和睦的家庭）；小说里也没有提出这种陈义过高的主张，尽管作者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如果要从维护革命道德的角度出发，就这篇小说展开讨论，我以为先要弄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上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什么，资产阶级道德是什么，封建主义道德又是什么，然后再来立论才好。千万不要重复在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之前就急于“大反修正主义”的悲剧了。

然而，对于这样的大题目，我缺乏理论的准备，是插不上嘴的。只是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小说男女主人公一生中总共相处不到二十四小时，甚至连手都没有握过，按照“至圣先贤”定的规矩也算

得上“发乎情，止乎礼”了，而竟受到一些论者的非议，不禁使我想起一句“有甚于画眉者”的名言。

两千年前，汉宣帝时有一个京兆尹（就是首都的行政长官），名叫张敞。据说在他的治下“市无偷盗”，看来工作做得还可以。但是有一件事引起了在朝在野的道德家、准道德家们的叽叽喳喳，那就是他曾经在家里给妻子画眉。一下子传遍长安，连皇帝也可能从什么人的简报里见了，那时候“大一统”的皇帝是什么都要管的，就来垂问。张敞的回答是：“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甚于画眉者。”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按照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礼法，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道德的，纳妾、私婢、蓄面首、狎爱童，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道德的，就是道学夫子缠夹官妓，若不是卷入官场的倾轧，也未必会被人兜底揭出来。唯独给老婆画眉会作为不道德的行为，成为非议的口实，我很疑心是张敞得罪了什么人的缘故。

然而逼得张敞讲了一句无可辩驳的大实话。这桩公案也就了结了。这固然要归功于汉宣帝表现出不矫情的器度，网开一面，不了了之（看来刘邦的后人中，文、景、武、昭、宣确是好样的），更要归功于张敞在一切都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年

头敢于冒死陈情。“有甚于画眉者”，恐怕其实首先不是指的“闺房之内，夫妇之私”，而是指的阿Q之流在女人面前的飘飘然的勋业吧。对于几千年封建社会虚假的道德、伪善的体统，“有甚于画眉者”六个字抵得上一篇声讨的檄文。

封建主义，倒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当代的江青，一句话骂倒千古民歌，说民歌无非是“情郎妹子”。真是左而又左，纯而又纯，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低级趣味”，人间烟火。在江青操办的戏剧里，不但情郎、妹子不能见容，而且家庭、夫妇也几于消灭，闻情歌而扼腕，见恋爱而惊心，仿佛江青在奉行清教徒的道德了。然而“彻底”一至于“透底”，也就漏出“底”来，套用张敞的貌似率直、实则含蓄的话来说：原来“有甚于画眉者”，有甚于歌唱“情郎妹子”者！

以所谓“男女之大防”，掩盖帷薄之后的荒淫无耻，这就是封建道德的表里。对前者振振有词，对后者不置一词，这就是维护封建主义的舆论的精蕴。

（《文艺报》1980年第8期）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有人说，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

期期以为不可。

话是从肯定唐太宗李世民“举贤纳谏”说起的。人们常以犯颜直谏的良臣魏征同唐太宗的关系为例。魏征也确实有点批龙鳞、不怕死的精神，一生陈谏数百事，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魏征“阿党亲戚”，审查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起魏征生前搞小集团。后来又发现魏征把前后“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有整“黑材料”之嫌，唐太宗更加不高兴，一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作文书写的墓碑推倒。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到了贞观十八年

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唐太宗同魏征的关系并不那么甜蜜，魏征的日子看来并不好过。“伴君如伴虎”，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唐太宗大约也并不特别可亲可爱，因为一个封建皇帝的“民主作风”毕竟是有限的。

不过，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算个“好皇帝”。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巴望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呢？倘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唐太宗”再世，恐怕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什么终身职、世袭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分封割据、山头行帮，以至“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难免就要顺理成章地合法化了。

因此，一句话：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我们多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决不是由于缺少“唐太宗”或别的“好皇帝”，而恰恰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够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招致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横行。

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作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作选择。

而巴望出现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即“好皇帝”的心理，使我们想到封建社会中暂时还没有做稳奴

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它产生在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思治之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会使我们忘记或放松对封建主义残余的警惕和斗争。那结果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是危言耸听吗？居安思危，正是为了真正的向前看，

（《北京晚报》1980年8月7日）

也是“可怕的现象”

一九二八年四月，鲁迅先生在杂文《扁》中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不想时隔五十二年之后，我们的文艺界还是出现了跟鲁迅先生说过的有些相似又不完全相似的现象。

今年早春二月，首都某刊登过一篇“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指出有人“把现代印象派的绘画”“当作宝贝，大加欣赏，到处推销”云云。

初夏五月，《读书》杂志发表了吴甲丰的文章，说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的确出现过—个绘画流派叫作“印象派”，到八十年代末已近尾声；然而世界上根本没有过一个“现代印象派”，因为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美术家的心目中，这个距今一百年左右的“印象派”早已过时了。

对于无知而又略有求知欲望如我者，这也是个难题。一位是著名刊物的特约评论员，一位是长期研究西方美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看同属权威，到底听谁的好呢？所谓美术上的“现代印象派”，倘信其有，到哪里去找代表作？倘信其无，那又怎么解释评论家之郑重其事地大张挞伐呢？

我孤陋寡闻，只能作些揣想：或许是画家笔下出了什么“洪水猛兽”，无以名之，遂名之曰“现代印象派”。记得江青曾骂“印象派”是“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凭这个“印象”，揆情度理，既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则越是现代的必越可恶；“现代印象派”者，当然就是应该罪加一等的双料腐朽下流的东西无疑了。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我想，在极左流毒尚待继续肃清的中国今天的文艺界，可怕的现象是在“输入名词”之外，还有生造的可以作为罪名的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实指和所以生造它的由来。众所周知，文明古国多刀笔，